

刘大志 著

# 地方政府竞争



## 资本形成

# 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本形成

刘大志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本形成/刘大志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 - 7 - 306 - 03148 - 8

I. 地… II. 刘… III.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543 号

---

出版人：叶侨健

策划编辑：鲁佳慧

责任编辑：鲁佳慧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曾育林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zdebs@mail.sysu.edu.cn](mailto: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广州市迎高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11.75 印张 210 千字

版次印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000 册 定 价：28.00 元

---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序

进入 2008 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且强劲延续至今的通胀风险相伴随，后续发展中的通缩风险正在持续攀升。这直接导致政府对“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忧虑加剧。而正是基于这一忧虑，2007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防通胀、防过热”为中心的“两防”方针，已在 2008 年 4 月 1 日公布的《国务院 2008 年工作重点》中转变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这是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中首次提出要防止经济下滑，说明当前影响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国内外因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更直接对我国宏观调控的能力构成了严峻挑战。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经济形势严峻程度的认识，以及对宏观调控方向的确定还是比较客观、务实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解析当前的滞胀风险成因与宏观调控手段成效，就会发现某些深植于我国经济运行逻辑之中的内在机制性、体制性问题，尚未被当前的政策所明确包含、体现和关注。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国地方政府竞争下的资本形成格局演进问题。

首先，关于滞胀风险成因。

到目前为止，对当前形势的主流分析，存在着两方面值得反思的倾向。

一是外部因素对经济内在周期性的掩盖，即过分强调我国当前困境的输入性原因，将流动性过剩与收缩趋势的全球传递，以及全球消费品市场吸纳能力的变化等方面作为主要推动力。由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与全球性的通胀和衰退趋势相伴随的，因此在节奏上与国际发展走向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并形成共振。这在较大程度上掩盖了我国内在问题的严峻性。实际上，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国内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与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局引发所致。短期主要表现为输入性的原因与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叠加效应，长期则主要表现为因内部相关改革滞后而积累问题的持续释放过程。换句话说，我国经济体系内在的矛盾积累是当前形势的主

要成因。从相当程度上而言，即使没有以美元贬值、次贷危机为代表的外部牵引，我国经济经过2003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也将步入高通胀、低增长的危险区域。回顾可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五次通货膨胀，分别为：1979—1980年，最高通胀率为6%；1984—1985年，最高通胀率为8.8%；1987—1989年，最高通胀率达到18.5%；1993—1995年，最高通胀率为21.7%；2007—2008年，目前最高通胀率达到8.7%。每一次通货膨胀都是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为动力，以宏观调控后的经济滑坡为代价。这是我国因资本形成体制缺陷而形成的内在周期。不能明确这一点，就无法对当前形势进行清晰的判断和应对。

二是产业困境对深层次体制性问题的掩盖。一般认为，当前的通胀趋势，以及潜在的衰退风险，就内因而言，较大程度上缘于结构性的产业困境。即三产结构中，服务业扩容远远不足，二产过重导致投资拉动的通胀风险累积，而二产中过于依赖出口的外向结构，又使得出口滑坡的潜在衰退压力得以迅速传递。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工业产值在1990年至2000年间以每年13.7%的速度增长，在2000年至2005年间，年增长率为10.9%，而GDP在这两个期间的增长比率仅分别为10.6%和9.6%。工业产值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按市场价格计算，截至2005年，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达48%，比历史高点的1990年（42%）还高。同时，中国的出口已占GDP的38%，这个比重在美国和印度仅分别为10%和21%。这使得中国体现出了类似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小规模经济体的特征，受外向影响极大。据最新统计，今年我国首季出口额3085.97亿美元，按年升幅仅21.4%，与去年同期增幅锐减6.4%。考虑到现时的出口增速表现，只能反映数个月前的定单情况，所以当前的出口颓势可能尚不止此。以上数据显示，以产业结构为困境主因的看法与当前我国的经济表现是比较符合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我国会长期维持这样一种产业结构？这就必然涉及到相关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如果说外因方面主要在于我国外汇管理与货币发行的体制缺陷，那么内因方面则直接指向我国的资本形成机制问题，其核心是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问题。

其次，关于宏观调控成效。

针对此次滞胀风险，国家已经推出了积极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成效尚未明显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国内“价格剪刀差”已经开始出现逆转，即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与CPI（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小。这说明下游制造尽管面临充分竞争，却已经无法通过扩大生产、降低劳动者成本等方法消化增加的成本。工业品涨势渐成。全面的通胀预期已经开始确立。同

时，针对通胀的紧缩政策与出口减缓的趋势一起，正在对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造成更大的冲击。国有银行利率每调整 0.27 个百分点，江浙地区的民间利率则要平均上升 1%，达 4 倍之多。主流金融渠道的收缩直接导致支撑民营企业的民间金融环境加倍恶化，经济硬着陆的后续风险必然处于累积之中。而这种危险局面的持续存在，是与我国宏观调控手段与宏调体系的两方面缺陷密切相关的。

一是宏观调控体系的博弈刚性。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存在着内在的抵制动力。这是由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发展格局所引致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必然存在着持续的投资冲动，从而对以紧缩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对冲，抵消了相当部分的政策效力。本次宏观调控展开之初，明确提出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但各地地方政府没有一个认为本地发展过热过快，仍然大力推进招商、投资，并想方设法规避宏观调控。这种博弈刚性在分税制改革以后的历次调控过程中都明显存在，构成影响宏调效果的隐性作用机制。

二是宏观调控手段的行政惯性。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历了 1993 年以后的高增长、高通胀，1989 年以后的低增长、低通胀，1998 年以后的高增长、低通胀等阶段，而 2008 年以后则可能要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的新局面。回顾历次通货膨胀治理可以发现，由于博弈刚性以及资本形成的行政性等原因，虽然利率、准备金率等市场手段运用的比例日益增加，但最后基本上都是通过对投资和货币供应采取行政性紧急刹车的办法才得以贯彻调控意图，从而形成很强的行政惯性。本次调控同样如此。政府在紧缩货币政策之外，又叠加了扩大财政支出的办法。同时在控制通胀和防止通缩两线作战。但是，行政性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损及经济向内需转变的结构性调整进程，扩大财政支出在投资导向上必然倾斜于国企和公共项目，挤出民间资本，形成新形式的“国进民退”，导致资本形成过程进一步行政化，从而损及经济发展的自发动力。

走笔至此，已经可以明确，我国由地方政府竞争所推动的资本形成困境是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性涨落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本轮周期同样遵循了这一过程和机理，即使没有外部影响，也会进入滞涨风险阶段。只是程度不同，时间稍异罢了。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开放度远较过去历次周期时为高，在恰巧叠加上外部周期的情况下，必然形成共振，并导致局面更为复杂和严峻。在此情况下，采取现有的政策手段，应对外部通胀和紧缩因素的冲击，固然是当务之急，但如果前述体制困境没有解决，很可能导致资本形成的低效局面持续，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散乱，通胀与经济下滑的程度加深，不利

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为此，在应急性宏观调控措施以外，还应该尽快进行深层次的体制调整，以收标本兼治之效。本书正是针对相关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主要的观点线索如下：

(1) 中国的资本形成格局正处于从政府行政性一元主导向市场性一元主导演进的市场化过程中。这一演进过程的渐进性质导致了目前行政与市场二元并存的重要特征。进一步的演进有可能步入快速的市场化轨道，也有可能陷入消极的路径依赖而面临“锁定”的僵局。

(2) 对资本形成格局市场化系数的考察表明，虽然格局演进的总体市场化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质性制度变迁支持，往往产生徘徊与反复，从而使得格局演进相对于整体经济发展进程而言，形成滞后。

(3) 地方政府竞争是影响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此意义上，我国资本形成总体格局演进只能是各种极具差异性的地区演进过程的复合结果。其市场化的总体进程，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政府竞争的强度和地区间市场化的差异程度。

(4) 在政府竞争强度较高的情况下，不同市场化水平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将导致不同的博弈均衡。在发达地区之间以及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博弈中，资本的行政性形成将继续获得强化的逻辑。同时，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将体现在资本形成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并在各个环节都表现出市场与行政的双重倾向。因此，政府竞争使地方政府对行政性资本形成的依赖难以消除，从而影响资本形成格局的进一步市场化。

(5) 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形成的总量、渠道、主体，以及结构效应支持了同样的观点，即在地方政府围绕资本形成进行的竞争博弈中，推动资本的市场化形成不能成为各地区最终的博弈均衡，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演进因此陷入困境。

(6) 在无法克服地方政府行政性路径依赖的情况下，政府竞争与资本形成之间产生循环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国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的“锁定”僵局。

(7) 对格局演进的困境求解，必须从改变和改善目前的政府竞争局面入手。对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东北地区的对比考察表明，区域竞合是改善政府竞争局面，促进金融深化的全新路径。推动区域竞合的市场化过程将有利于打破僵局，使推动资本形成市场化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博弈均衡。

本书对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跳出了以往偏重于资本形成的纵向机制和规模、结构的思维惯性，抓住我国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变迁这一主线，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加以考察，揭示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动态过程对总体格局演

进的作用机制与结果，也在一定意义上，使“地方政府竞争”这一“大国分析框架”得到了更为具体化的尝试运用。这一视角选择在关于资本形成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国内外研究中，是颇为独特和罕见的，也是符合我国资本形成实际的。其不仅使我国资本形成格局演变的真相得以复原，而且对现有的格局演进状态形成了新的、合理的解释，有助于厘清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机理，从相当程度上来说，也有助于深入认识当前我国滞胀风险的成因所在，并有助于寻求更为切中肯綮的治理对策。

本书的主体框架初构于2003年，正值2003—2007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黄金五年”的起点。当时搁笔之际，并未预料到5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发展会同时遇到高通胀和低增长的风险。但是，在相当意义上而言，这一局面的形成，却依然符合本书的理论延伸。中国经济要摆脱当前的滞胀风险，必须进行经济结构与运行体制的战略调整。而其深层调整的战略取向之一，很可能就是使本书的研究对我国经济不再具有解释力。

我期待着。

是为序。

作者

2008年6月9日于大连

## 引　　言

成功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持续有效的资本形成。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发展理论史的角度来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都无可怀疑。从当代各国经济的发展现实来看，亦是如此。这不仅因为只有资本大规模地有效形成才能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推动其进入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的现实过程（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因为被广泛认为是帮助发达国家获得持续增长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也是内含于资本形成之中并通过资本形成来发挥作用的。对于这一点，以强调技术进步而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在其1987年诺贝尔奖演讲中曾公开承认，对技术进步内含于资本形成这一机制的忽视使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偏向于不利于投资的方向。而事实上，改善投资的政策不仅会带来较高的资本密集度，而且可以导致新技术较快地向实际生产转移。<sup>①</sup>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Scott）甚至指出，当考虑到人口变化时，“一切增长皆来自于投资”，“再也没有什么明显能分得开的称作‘技术进步’的第三个要素”。<sup>②</sup>在此意义上，投资与资本形成的持续性、有效性与合理性，显然构成了现代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改善资本形成状态的努力，也因此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

但是，无法忽视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其最主要的区别表现为二者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对资本形成状态的改善——包括资本形成的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将首先体现在对资本形成各方面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与推动上。到目前为止，已有的资本形成方式大致可以包含在由行政主导或由市场主导两种基本的资本形成格局之内。我国的资本形成格局正处在从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变迁的渐进过程之中，如何推动这一格局演变的过程顺利进行正是改善我国资本形成状态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课题。

在对中国经济的众多评论中，资本形成、劳动投入、科技进步、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制度变革等因素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不同观点表现为对这些因素的不同侧重。而且，对不同经济增长要素的强调导致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不同预期，也导致迥然相异的对策建议和改革思路。但是，当

我们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去寻找一种能够推动和支撑中国转轨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持久因素时，就会发现，对资本形成作用的强调是不约而同的。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条件不同，中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是在资本形成格局本身不断的二元化演进过程中实现的。从行政一元主导到行政、市场二元并存，乃至向更高程度的市场化过渡，这一过程在不同时期产生的结果，直接影响了中国曾经的和现在的经济增长。这不仅已被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历程所证实，而且也为仍在进行的、进一步的市场化转型所强化和突出。

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进度只有与转型期特定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相对于整体经济转型来说，目前我国资本形成格局的动态演进，正在经历着一个市场化程度滞后的二元强化阶段。它日益将资本形成格局的演进态势置于一种既关键又敏感的境地：一方面，如果现有格局能够实现进一步的良性市场化发展，那么，资本形成状态的明显改善就将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对资本形成的要求，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更优的支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内在的不确定性和资本形成格局演进本身的不稳定性已经导致了多种路径依赖和临界状态，如果不能避免进入低效或无效的演进路径，就可能损失已经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导致风险过度累积，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发生变化，市场化转型受阻。因此，对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来说，如何推动二元格局的良性演进，并保持演进过程中持续有效的资本形成，已经显得非常紧迫，不可不察。

同时，从理论层面来看，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对资本形成市场化过程的揭示与探究，一直是有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对这一过程的演变逻辑与路径，迄今未能形成共识和定论。尤其是对转型期大国，其政体改革与经济转型相交织的复杂局面，以及政策实施与制度变迁的明显的空间差异，正在对现有理论提出巨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以转型期大国为背景，对中国资本形成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深入考察，其理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关于资本形成市场化演进的论述远远不够充分和明晰。这与它们已经形成相对发达完善的市场和金融投资体系的经济现状有一定关系。因此，在它们的理论中，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往往假设资本形成的制度背景是给定的，资本形成的过程是平滑无成本的，或者影响资本形成的政府是同质不可分的。这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剧烈的制度变迁的现实是明显不符的。对中国的资本形成问题来说，有意义的不仅是探讨什么样的资本形成机制与格局有利于资本作为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发挥作用，更要探索影响中国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的理论和现实逻辑，考察如何推动既有

的资本形成局面向理想状态逐步逼近，并同时与总体制度变迁的长期趋势良性兼容。这是一个牵涉甚广的重大问题，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的有效做法显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科学地选择视角。

受西方经济学研究思路的影响，目前对中国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多从货币金融体系、财政税收体制以及外贸汇率机制等纵向方面入手，或对储蓄决定、投资结构以及资本形成的要素贡献等进行实证分析，而对影响资本形成机制与格局的重要因素及由其所形成的横向方面——地区差异和地方政府行为——重视不够。这使资本形成市场化逻辑的部分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实际上，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态势来说，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意味非常浓厚，政府竞争是我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进程中被普遍忽视的重要动力源。许多关于资本形成的特殊现象只有引入政府竞争才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可以说，中国资本形成格局的演变与政府竞争格局的形成过程是基本同一的。政府竞争的重要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的路径和进程。在此意义上，资本形成格局演进进而经济增长的地区（区域）差异都可以从政府竞争的角度加以分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区域发展”，“强化市场的统一性”，<sup>③</sup>这对改善目前的地方政府竞争局面提出了现实要求，从而也为资本形成格局的进一步市场化演进指明了方向。因此，本书将从政府竞争的角度来解释和探究我国资本形成的格局变迁，发现和确定政府竞争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方式，并进而探讨如何通过改善政府竞争局面来推动和影响资本形成格局的演进过程，发掘其中的政策含义。

本书在后面的论述中，对资本形成概念的应用，除特殊指明外，都指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等有形资本形成。

#### 注释：

① (美) 索洛：《经济成长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17 页。

② M. Scott. *A New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

③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中国经济时报》，2003 年 10 月 22 日。

# 目 录

引言 .....	(1)
<b>第一章 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 .....</b>	<b>(1)</b>
第一节 资本形成理论概述 .....	(1)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形成理论演进 .....	(1)
二、《资本论》中的资本形成思想 .....	(6)
三、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研究焦点及其进展 .....	(8)
四、对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简单评论 .....	(12)
第二节 发展经济学对资本形成问题的考察 .....	(13)
一、政府推动与资本形成 .....	(13)
二、工业化进程与资本形成 .....	(14)
三、货币金融体系与资本形成 .....	(15)
四、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与资本形成 .....	(17)
五、对发展经济学资本形成理论的总结与评价 .....	(19)
第三节 国内的资本形成研究 .....	(21)
<b>第二章 资本形成格局的演进：一元主导与二元并存 .....</b>	<b>(27)</b>
第一节 资本形成格局的一元主导 .....	(27)
一、行政主导与市场主导的理想类型 .....	(28)
二、市场主导下的多种资本形成模式 .....	(30)
三、资本形成模式的自发演进 .....	(39)
四、自发演进与路径依赖 .....	(42)
第二节 中国资本形成格局的二元并存 .....	(44)
一、改革前的行政一元主导格局 .....	(45)
二、从一元主导到二元并存 .....	(53)

<b>第三章 资本形成格局二元演进的现实路径</b>	.....	(63)
第一节 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的现实考察	.....	(63)
一、二元资本形成的市场化系数	.....	(65)
二、市场化系数上升与相应制度突破的不对称	.....	(66)
第二节 格局演进中的地方政府	.....	(70)
一、格局演进与政府储蓄、投资	.....	(70)
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部分替代	.....	(71)
三、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	.....	(72)
第三节 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本形成格局演进	.....	(78)
一、关于政府竞争	.....	(79)
二、作为供给者与参与者的政府竞争	.....	(81)
三、资本形成的政府竞争维度	.....	(82)
<b>第四章 地方政府竞争的资本形成效应</b>	.....	(93)
第一节 阿波尔特模型的悲观推论	.....	(93)
第二节 政府竞争的资本形成效应	.....	(94)
一、总量效应	.....	(94)
二、渠道效应	.....	(101)
三、主体效应	.....	(108)
四、结构效应	.....	(118)
<b>第五章 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突破的求解逻辑</b>	.....	(129)
第一节 政府竞争下的格局演进Ⅰ：过程同一与逻辑差异	.....	(129)
第二节 政府竞争下的格局演进Ⅱ：双重困境与效率损失	.....	(131)
一、双重困境	.....	(131)
二、效率损失	.....	(131)
第三节 格局演进突破的求解路径	.....	(133)
一、软逻辑与硬逻辑	.....	(133)
二、区域竞合对地方政府竞争困境的求解	.....	(135)
第四节 对策建议与思考	.....	(150)
一、加强地区政府竞争协调，完善区域经济利益获得机制	.....	(151)
二、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化，规范公共支出范围	.....	(152)
三、加强地区间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统筹区域发展	.....	(152)
四、推进落后地区国企改革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实行区域性的	.....	

## 目 录

M u L u

---

货币金融政策 .....	(153)
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推动体制外金融发展 .....	(153)
六、大力发展直接金融，构筑区域资本市场 .....	(154)
第五节 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	(155)
一、振兴东北与资本形成市场化 .....	(155)
二、区域竞合是振兴东北的关键 .....	(158)
参考文献 .....	(163)

# 第一章 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形成

## 第一节 资本形成理论概述

资本形成是市场经济运行和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综观西方经济学，讨论或涉及资本形成的学说和流派多种多样、层出不穷。虽然专门的、统一的、成体系的资本形成理论并不存在，但有目共睹的是，几乎绝大多数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思想都可以在资本形成的论题之下找到交点、形成交集，从而使得资本形成的理论积累日益深厚。这不仅说明了资本形成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和理论生命力，而且使资本形成的理论沿革本身越来越逼真地暗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奥秘。

在资本形成的理论轨迹中，有关资本积累的思想构成了它的重要内容。从语义上讲，资本积累强调资本形成的来源或结果，而资本形成则首先是一个过程，然后才作为资本存量增加或效率改变的结果起作用。在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看来，资本积累即国民储蓄，在从储蓄到投资的过程无摩擦的情况下，国民储蓄与资本形成是等量的，资本积累也就与资本形成具有了量上的一致性。因此，在传统西方理论的语境中，二者是没有明显区分的。但是，从储蓄到投资的无摩擦假设显然是脱离现实的。现代资本形成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从储蓄到投资再到实际资本形成这一过程的日益关注和强调。这一特征的形成过程与资本形成理论的演变发展过程是基本同一的。

###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形成理论演进

如果放宽资本范畴的历史性规定，对资本形成问题的讨论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兴起之前就已经大量出现。这一点可以突出地从重商主义有关的理论思想中得到发现和证明。意大利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杰出代表托马斯·孟（Thomas Mun）等人都曾就如何扩大本国商业资本的形成规模进行过探讨，并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有关资本形成的开放经济体系视角和国家干预思想。<sup>①</sup>但是，由于这些思想只关注商品流通过程和产业资本的特殊转化形式，基本没有针对生产性投资，既没有

资本形成的明确概念和认识，也没有为利润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形成找到真正的合理来源，所以只能成为资本形成理论的历史准备阶段，而且也常常为后期的资本形成理论研究所忽视。

由于资本范畴的严格确立显然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确立后的结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形成思想产生是18世纪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情。

### （一）古典学派的资本形成观点

资本积累作为资本形成的古典术语，其重要性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普遍强调和重视。斯密（Adam Smith）指出，“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sup>②</sup>不断积累资本将使一个充分自由的经济社会获得内在发展动力。以此种认识为基础，这一阶段关于资本形成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对物质资本形成来源的探究和追寻上。斯密吸取重农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资本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节约而不是勤劳”，<sup>③</sup>首开了资本形成源于国民储蓄的思想先河。

### （二）新古典学派的资本形成思想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物质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和来源进一步受到关注。瓦尔拉斯（Walras）、卡塞尔（Cassel）、马歇尔（Marshall）、埃奇沃斯（Edgeworth）、克拉克（Clark）、维克塞尔（Wicksell）等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家延缓当前消费，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增加投资的结果。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论述说：“上一代的经济学家把储蓄看做差不多完全从资本和利润中得来的……在一切初期文明阶段，它是积累的主要源泉。”<sup>④</sup>

另一方面，尽管新古典主义者否认货币体系对资本形成有意义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但与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相适应，资本形成的利率机制已经开始进入学术视野。马歇尔认为利率的升降对储蓄与资本形成有明显的调节作用。“对资本所提供的利率——即储蓄的需求价格——之上升，势将增加储蓄额”，而“利率的继续下降，世界资本每年增加额的继续增大就会随之而来”。<sup>⑤</sup>随后，以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为代表，货币利率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机制开始得到发掘。因为“在实际的经济情况中，则一切交换、投资或资本转移事实上都是通过货币实现的”，<sup>⑥</sup>所以货币的中立性观点应该被有所修正。维克塞尔把利息率分为货币利率（即金融市场上的实际利息率）和

自然利率（即资本的边际利润率）。如果两种利率相等，则投资与储蓄相等，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如果自然利率大于市场利率，投资就会增加，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社会收入增加，物价上涨，直到工资和原材料价格因经济扩张而上涨，生产成本提高，自然利率向市场利率靠拢，经济恢复平衡；如果市场利率大于自然利率，投资将减少，资本形成不足，经济收缩，物价回落，生产成本下降，自然利率回升，经济重新趋向平衡。因此，要实现经济均衡，对货币利率，进而资本形成的政策调控是必要和可能的。

### （三）凯恩斯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形成

在凯恩斯（J. N. Keynes）的理论模型中，投资从而资本形成不足是社会就业不足的根源。由于资本家预期的利润率大小和利息率高低是决定资本家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因此如果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至利息率以下，资本家对投资物的生产需求就会缩小，资本形成规模收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导致非自愿的社会失业增加。由此可见，要实现充分就业，扩大资本形成，必须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使资本家的投资预期高于利息率。因为“利率降到一特定量时，投资将增加若干”。<sup>⑦</sup>但是在无调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持有货币的流动偏好心理，货币需求居高不下，利息率的自动和持续下降是不可能的。为此在流动偏好不变的情况下，要采取金融政策，通过银行系统扩大货币供给数量，扩大信贷，增加支付手段，以刺激投资和资本形成。凯恩斯在强调利息率对资本形成的刺激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政府直接扩大投资的赤字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带动私人资本形成，对资本形成的金融渠道与财政渠道都做出了深入的探讨。以此为起点，货币体系与公共投资日益成为可以直接影响资本形成的有效政策工具。

但是，凯恩斯理论具有短期静态分析的性质，并未论及长期资本形成的动态均衡基础。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引入长期动态分析，就此发展了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  $G = S/K$ 。该模型认为，在资本产出比率  $K$  不变的条件下，要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就必须将全部储蓄转化为投资。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储蓄率  $S$  等于资本形成率，则经济增长率  $G$  就唯一受制于资本形成率，从而把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但其对欠发达国家的增长研究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一致强调资本形成重要性的局面。

随后的索洛（Solow）—斯旺（Swan）模型指出：经济增长体现为资本积累。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只有资本—劳动比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才能持续。然而，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资本积累的速度不可能持续高于